

聊斋论稿

谭兴戎 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聊斋志异卷之四
淄川 王士
新 何

聊斋志异卷一

淄川 王士



聊斋志异卷一

聊斋志异卷一

方城陞

予幼文之祖宋公諱憲字厚生一日病卧見吏人持牒蒙白頭馬來云持赴試公言文宗未臨何遲持方吏不言但數促之公乃病未為位去路無從謀至一城郭如至者却轉時入府庫室壯麗上坐于廳堂初不知何人惟聞壯健可操厚下致此數各二先有一秀才望其來公但與連肩几上各有二心物各紙飛下視之八字云二人一人心無二公文成呈殿上公文中有云有心物各紙飛下視之八字云二人一人心無二公文成呈殿上公文中有云有心物各紙飛下視之八字云二人一人心無二公文成呈殿上公文中有云有心物各

五月五日其楚開有國
先以金幣其父母其
同里鄉江有將氏其阿

設此城各二先有一秀才望其來
年秋俄起總能下視之八字云一

贈

聊斋论稿

谭兴戎

谭兴戎 著

沈代王 编辑并序

河南人民出版社

郑州市

河南人民出版社

(豫)新登字 01 号

聊斋论稿

聊斋论稿

著 者 谭兴戎

责任编辑 王丹方

*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乡市印刷厂印刷

*

781×1092 毫米 32 开本 4.875 印张 95 千字

1994 年 6 月第 1 版 199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 册

ISBN7-215-03217-5/K·480

定 价: 3.50 元

目 录

蒲松龄的生平、交游和时代	(1)
蒲松龄的政治思想	(20)
蒲松龄的哲学思想和宗教鬼神观念	(32)
《聊斋志异》塑造人物方法上的特色	(48)
《聊斋志异》和唐传奇的比较	(66)
《聊斋志异》和《聊斋俚曲》的比较	(75)
《读聊斋杂说》发微	(92)
附：《读聊斋杂说》	(104)
《聊斋志异》的版本	(114)
《聊斋志异》本事补	(125)
《聊斋志异》研究的历史和现状	(129)

蒲松龄的生平、交游和时代

蒲松龄，字留仙，又字剑臣，号柳泉居士，世称聊斋先生。公元1640年（明崇祯十三年）生于山东淄川县城东七里许的蒲家庄。公元1715年（清康熙五十四年）在家乡病逝，享年七十六岁。他的一生，生于明末，长于清代顺治年间，主要活动于康熙年间。

蒲氏家族，是世代居于淄川的土著，为元代功臣蒲居仁、蒲鲁浑的后裔。至明代万历年间，淄川有八名领取官粮的秀才，蒲氏家族便占了六名，以后科甲相继，成为书香门第，淄川望族，但族中没有十分显赫的人物。

蒲松龄之祖蒲生泖默默无闻。松龄父蒲槃，字敏吾，家贫力学，二十多岁还考不中一个秀才，不得已弃儒经商，数年间成为家乡富户，曾作过一些赈贫济困，修庙塑神的善举，灾荒年还曾按日向贫苦乡人施米。但晚年家道渐落，至不能为子延师。蒲槃虽科场失意，但经商之余不忘经史，故而学问很好。他的四个孩子都是他亲自教读，其中三人均考中秀才。

据《淄川县志·卷十三·“续隐逸”》载，公元1646年，山东淄川谢迁发动农民起义，打土豪，杀汉奸。在攻打县城途中，在蒲家庄遭到顽强抵抗，不得不绕道前进。

这次抵抗义军的为首者，就是蒲松龄之父蒲槃和叔叔蒲祝。值得注意的是，是年松龄年已七、八岁，此举应为亲眼目睹之事，但在蒲松龄亲自修订的蒲氏族谱中，却只字未提。此事可以与蒲松龄在文学作品中对农民起义所持的同情态度互相补证。

蒲槃娶董氏、孙氏、李氏，松龄为董氏所生。董氏家世不详。

总之，蒲松龄的家庭，在经济上属于下层地主、商人，在文化层次上属于书香门第，在政治上则属于封建统治阶级的社会基础。这样的家庭，不可能在蒲松龄的生活道路上给他以政治、经济上的支持，但却会赋予他正统的儒家思想，赋予他积极追求功名，以求出人头地的人生观，赋予他比较深入地了解社会、了解民情的条件。

蒲松龄的生平经历，可以用“平淡无奇”四字概括。其主要事迹，不过是读书、教书、著书而已。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十一岁到三十岁。

蒲松龄十一岁开始读书，由其父蒲槃启蒙，读《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十三四岁，开始读四书五经，学习八股文写作，其目的是继承父志，金榜题名。但是蒲松龄最喜爱的书，还是《庄子》、《列子》、《史记》、《李太白集》等。这些作品神奇瑰丽的想象，汪洋恣肆的文风，显然为蒲氏后来的文学创作提供了滋养。

顺治十五年（公元1658年），蒲松龄十九岁。他在科举考试中连获县（淄川）、府（济南）、道（山东学

道)考试三个第一,考中了秀才,大受山东学道施闰章的赏识。当时的淄川县令费祎祉对蒲氏亦十分器重。蒲松龄少年得志,意气风发。此后几年,他一方面苦读求进,一方面与朋友诗酒唱和,过了一段愉快的生活。他二十岁时与朋友张笃庆、李希梅、王鹿瞻等结为郢中诗社。蒲松龄在《郢中社序》^①中指出:科举制艺,是读书人的正业,而诗歌是旁门余业。但是,结成诗社,可以互相切磋学问,修养道德,对举业也有帮助。可见,此时的蒲松龄,虽以风雅自赏,但其志向是集中在苦读求仕上的。不久,蒲氏又曾到淄川西南五十里的盘山青云寺读书。康熙三年(公元1664年),二十五岁的蒲松龄又住到李希梅家读书,“朝分明窗,夜分灯火,期相与以有成”^②一读就读了近两年。

但是,蒲松龄在此后的历次考试中,屡试不第,青云之志受到了重大打击。由于家庭生活之累,他再也无力专心苦读了。

蒲松龄于顺治十四年(公元1657年)与淄川文人刘国鼎之次女刘氏结婚,时年十八岁。二十三岁得子蒲箬。由于家中妯娌不和,二十六岁时分家。分家之前,家中生活尚有老父维持。分家之后,蒲松龄仅得田二十亩,村西场屋草房三间和少许粮食。从此,蒲松龄不得不负起养家的责任。他的长子蒲箬写道:“然自析箸,薄产不足自给,故岁岁游学,无暇治举业。”^③大约在二十六岁以后不久,蒲松龄开始了他的教书生涯。

在这个阶段,蒲松龄除了攻读经史,热心举业外,曾

写过一些与朋友的应答诗，今多不存。此外，还写过近百首民间俗曲。这些俗曲，现存日本庆应义塾大学，可惜我们未能寓目。但仅此事实本身，就足以说明蒲松龄不仅是个雅文学的高手，还是俗文学的热爱者，他后来创作的十几篇民间演唱文学《聊斋俚曲》正是在此基础上发展的结果。

《聊斋志异》始作于何时，尚无定论。但康熙三年（公元1664年，蒲氏二十五岁）蒲松龄的朋友张笃庆有《和留仙韵》^④，诗中有句云：“司空博物本风流，涪水神刀不可求。君向黄初闻正始，我从邺下识应侯。”意以撰写《博物志》的西晋司空张华比蒲松龄，并说他喜好黄初、正始文学。^⑤二十五岁的蒲松龄给挚友留下喜欢搜奇猎异、玄理神仙的印象，说明他在二十五岁以前，可能已经开始收集志怪故事，写作《聊斋志异》。

第二阶段，从三十一岁到三十二岁。

康熙八年（公元1669年），蒲松龄的老朋友孙蕙任扬州府宝应县知县，康熙九年（公元1670年），聘蒲氏为幕宾，司笔札。这是蒲松龄唯一的一次远出，也是他唯一的一次涉足官场。

孙蕙上任之初，宝应县因连年水灾，运河决口，正值“千古来未有之奇荒”，他“念国计尤念民生”做了一些免除杂税，兴修水利的好事。蒲松龄对好友的这种为官态度深为赞许，尽力辅佐。他还帮助孙蕙抵制贪官污吏的恶行。比如吴县县令韩某，要孙蕙趁宝应灾荒，替他买侍婢，蒲松龄代孙函答，有“弟忝居一隅，救荒拯溺，且愧无术，

何敢教之鬻子女耶？”之句^⑧可以看到，蒲松龄虽是区区幕宾，但他却以儒家“兼济天下”的思想指导着自己的行为，力图为国为民做些好事。

在孙蕙幕中，蒲松龄相当充分地认识了官场的黑暗，吏治的腐朽。这些，在他当时作的许多诗中有直接的反映，也无疑为《聊斋志异》的创作积累了丰富的素材。

在这个时期，蒲松龄已经在不间断地进行着《聊斋志异》的创作。《聊斋志异·莲香》篇末说：《莲香》的故事，是自己南游时在旅舍中看到王子章《桑生传》后创作的。他在给孙蕙、刘孔集的诗中还说：“新闻总入鬼狐史，斗酒难消块磊愁”^⑨，这说明他已经正式地、不间断地写《志异》，也说明他写《聊斋》是寄托自己的愤懑和忧国忧民之心的。

这一年多时间，蒲松龄还写了不少诗，集为《南游诗草》。他代孙蕙所起草的文字，收入《鹤轩笔札》。这些诗文，绝大多数已被路大荒收入《蒲松龄集》。

第三阶段，从三十二岁到七十六岁去世。

康熙十年秋，为了参加次年的会试，蒲松龄辞幕回乡。从此，蒲氏再也没有远离家乡，直至去世。

中年以后的蒲松龄，基本上从事三件事情：一是设馆授徒，二是参加科考，三是创作《聊斋志异》及其它诗文。

蒲氏到底曾在谁家任教，已难以一一确认。大抵早年曾在淄川王村设蒙馆，中年设帐于淄川王家，晚年长期在淄川王村西铺毕家做塾师。其中在毕家为时最久，几乎有

三十年。

蒲氏中年以后坐馆的王家、毕家，都不以一般塾师待他。王家的王观正、毕家的毕际有、毕盛钜父子都与蒲松龄有长期的友谊。蒲松龄在毕家坐馆，年束修在十六两银子以上，以《儒村外史》第二回所载“每年馆金十二两银子”来比较，为数也不算很少。但尽管如此。他还是处于贫困之中，以至母亲去世无力殡葬，只得向门人借贷，六年后尚未还清。

蒲松龄授徒，不但教他们四书五经、制艺文字，而且引导学生学习《庄子》、《列子》，学习写诗。他还写了《为人要则》十二条^⑩，教导学生为人之道，编写《日用俗字》、《农桑经》等实用性小册子，以使學生掌握农村生活的一般本领。

蒲松龄自十九岁考中秀才后，顺治十七年、康熙二年、康熙五年的乡试均未中举。南游归来后，康熙十一年（公元1672）年，他又参加乡试。这一次，孙蕙还特意向山东学官写了推荐信，但仍未考中。此后，他虽然已经设馆授徒，但仍然几乎是无试不考。他读四书五经，写八股文，而且写了大量“拟表”以备科考，这类“拟表”仅《蒲松龄集》收录的，就有八十篇之多。但是每次乡试，他仍然是铩羽而归。康熙二十六年，48岁的蒲松龄“应乡试，闱中越幅被黜。”^⑪只由于八股文超过了规定的七百字而名落榜下。康熙二十九年，乡试头场试毕，试官已有意取蒲氏为解元，但不料第二场考试，松龄竟因病未能终场，又被黜落。就这样，蒲松龄从十九岁直考到六十三岁，考了四

十四年，仍旧是老秀才一名。此后他自己已力不从心，又把希望寄托在儿孙辈身上。他给自己的儿子写诗说：“不受三年劳，遂得百岁苦”，“一备弟子员，云霄已腾举”，并且鼓励他们“不患世不公，所患力不努”。⑫

康熙四十一年，七十一岁的蒲松龄成为贡生。贡生有两类，一类是每一至三年或逢国家庆典，由地方选送年资长久的廪生入国子监肄业（实际上并不入国子监学习），称为岁贡或恩贡；一类是由各省学政择优考选，保送入国子监的，称为优贡或拔贡。前一类，实际上是对那些久不中举的秀才的一种安慰。当了贡生，就可以由地方政府在家中挂匾，门口竖旗杆，并能领为数不多的贡银（每年八两）。蒲氏就属于第一类。尽管贡生于富于贵均无实际意义，但蒲松龄竟然颇为重视，半年之内，一再上呈，要求地方当局兑现立旗、挂匾、发给贡银。由此可见蒲松龄在现实生活中对科举仕途的迷恋。

蒲松龄在康熙四十八的年底结束了在毕家的塾师生涯，归家养老，时年七十岁。此时，蒲氏已小有田产，仆耕婢织，妻贤子孝，不必劳神于生计；瓮中有粮，架上有书，樽中有酒，可以优游于世外，过了几年好日子。康熙五十四年（公元1715年），七十六岁的蒲松龄依窗危坐而卒。

在这个漫长的时期中，蒲松龄虽然仅仅是个秀才、塾师，但却不忘民生、不殚于为民请命。康熙四十三年、四十四年，淄川先涝后旱，继之以虫灾，蒲松龄写下了《康熙四十三年记灾前篇》、《秋灾记略后篇》详记灾情，字

里行间，充满了悲天悯人的痛苦。他还写了《救荒急策上布政司》一文^⑭，提出了五条救灾建议，希望布政史裁酌施行。康熙五十年左右，他写《淄邑流弊》、《淄邑漕弊》及《盐法论》等文^⑮，对官府的苛捐杂税和不合理的盐法，进行了抨击。他对于贪官污吏，恨之入骨，即便是故人大僚，亦不稍加容忍。他的老朋友孙蕙后来官越作越大，放纵家人在故乡鱼肉百姓，于是，大约在康熙二十年左右，蒲松龄写了著名的《上孙给谏书》，^⑯义正辞严地指出其族人、奴仆仗势欺人之劣迹。康熙四十九年淄川蠹役康世贞，投靠退職大司寇王士禎、退職知府譚再生，妄图包办漕粮征收。蒲松龄不惧王、譚势力之大，亦不顾与王士禎深厚的友情与文字之交，毅然上书县令，并致函王、譚，恳切陈辞。

蒲松龄二十五岁以前开始收集故事，创作《聊斋志异》，到四十岁时（康熙十八年，公元1679年），他写下了《聊斋自志》，说明了自己创作《聊斋志异》的态度和意图。这证明，此时《聊斋志异》一书大体已成形。但是，从《志异》中的文章看，《狐梦》记康熙二十一年事，《上仙》、《花神》记康熙二十二年事，《夏雪》为康熙四十六年事，可见《志异》的创作，应始于先生二十五岁以前，大成于四十岁左右，此后续作修改，一直持续到将近七十岁，是蒲氏毕一生心血之作。

蒲松龄一生，写了千首以上的诗歌，《蒲松龄集》所收已届此数。其中除七十多首是南游时所写外，基本上是这个阶段的作品。蒲氏词现存一百零二首，其创作年代难

以考定。蒲松龄还创作了十四种俚曲，三出戏，也基本上是这个时期的作品。《蒲松龄集·聊斋文集》收得蒲松龄各体文章四百五十八篇，其中多数亦为此时之作。此外，蒲松龄还撰写了近十种杂著，多为农村日用的知识性著作，其中，《蒲松龄集》收得的《日用俗字》、《农桑经》两种，蒲松龄故居现存《药崇书》一种，辽宁省图书馆存《聊斋杂记》手稿一种，均是这个时期的结撰。

蒲松龄一生交游颇广，其时间较长、友情笃厚的不下十人。现择其要者缕述如下。

张笃庆：字历友，号厚斋，又号昆仑山人。蒲松龄的同乡。他与蒲松龄青年时代就是好朋友，曾结为郢中诗社，直到老年友情始终不衰。张与蒲一样，科举失意，以坐馆为生。张笃庆学识渊博，作品有《昆仑山房集》存世。他有许多与蒲松龄唱和的诗作，是研究蒲氏的重要资料。

张笃庆对《聊斋志异》是十分推崇的，他曾在康熙四十七年为《志异》题律诗三首，其中有“董狐岂独人伦鉴，干宝真传造化工”之句^①，赞扬蒲氏可与春秋良史董狐相比，能通过记鬼狐之事反映人间伦理。但是，在《聊斋志异》的创作过程中，他对蒲松龄并不理解，时常劝喻老友不要为《聊斋志异》而贻误功名。康熙二十六年，他在《寄留仙、希梅诸人》一诗中，说：“此后还期俱努力，聊斋且莫竟谈空”^②劝他为功名多加努力，不要把精力放在“谈空”的《志异》上去。康熙三十三年，他又写诗怀念

蒲松龄，惋惜他误入歧途以至功名落空：“谈空误入《夷坚志》，说鬼时参猛虎行，咫尺聊斋人不见，蹉跎老大负平生”^⑩。张笃庆康熙二十六年、三十三年诗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有力的证据，说明蒲松龄在康熙十八年《志异》基本完成并作《聊斋自志》之后，仍然用了相当大的精力续作修改，这个工作，起码持续到康熙四十七年张笃庆为《志异》题七律三首之时。

孙蕙：字树百，又字安宜，别号笠山，蒲之同乡。顺治十八年进士，康熙八年任宝应县知县，后聘自己的朋友蒲松龄为幕宾。《聊斋诗集》中有不少作品是写给孙蕙的，《聊斋文集》中则收有许多蒲氏作幕宾时代孙蕙草拟的书信、呈示、文告之类的文章。蒲松龄与孙蕙为道义之交。早年在宝应县为宾主期间，曾齐心协力作过一些利民之事，后来孙蕙家人横行乡里，蒲氏则上书直陈，而孙蕙则“得书惊叹，立饬其下皆敛戢。”^⑪

孙蕙很重视蒲松龄的文才，但对《聊斋志异》的创作，则不太理解。康熙十一年，蒲氏再次落第，写七律三首寄给孙蕙倾诉悲愁。孙蕙回函安慰，并称：“兄台绝顶聪明，稍一敛才攻苦，自是第一流人物，不知肯以鄙言作瑱否耶？”^⑫所谓“敛才攻苦”应当理解为放弃《志异》的创作专心八股制艺。此言虽善，惜乎不知蒲氏之心。

王渔洋：名士禎，号阮亭，又号渔洋山人，山东新城人，顺治十五年进士，官至刑部尚书，为清初倡导“神韵”的大诗人。他于康熙二十六年任毕盛钜家第一次会见蒲松龄，此后虽再未谋面却书函不绝。王氏十分重视蒲松龄的

文才。他读了《志异》的部份作品后，于康熙二十七年写下了《戏书蒲生〈聊斋志异〉卷后》：“姑妄言之姑听之，豆棚瓜架雨如丝。料应厌作人间语，爱听秋坟鬼唱时。”此诗虽未能对《志异》作出应有的评价，但却准确地指出《志异》是蒲松龄怀才不遇之作，是借鬼狐之事隐寓现实之作。此后，王士禛屡次致函蒲氏，点名索要《志异》中的部分篇目，并且写下了若干条眉批。一代文宗王士禛的赏识，无疑给了蒲松龄极大的鼓舞，他对王渔洋的评点极为重视，以至在手稿中一一录出。王士禛也是个奇闻异事的爱好者，他编著了《池北偶谈》，其中有八条的内容分别与《志异》中的《小猎犬》、《妾击贼》、《斫石》、《阳武侯》、《五穀大夫》、《邵士梅》、《蒋太史》相似，另有《林四娘》与《志异》的题目相同。王士禛对蒲氏的诗文亦颇为欣赏，他赞誉蒲氏的《輓淮阳道》一诗“苍老几乎少陵矣”；他的《题〈聊斋文集〉后》则认为蒲松龄的古文“卓然成家，其可传于后世无疑也”。

高珩：字葱佩，号念东，别号紫霞道人。他是王渔洋的表兄，张笃庆的岳父。崇祯癸未进士，官至刑部侍郎。康熙十一年，由京归里，与蒲松龄交情渐密。高嗜诗书，善诗赋，与蒲氏为忘年交，经常在一起作诗论文。高曾向蒲氏提供素材，蒲氏据之创作了《志异·侯静山》。康熙十八年，高为《聊斋志异》写序言，认为它“皆足辅功令教化之所不及。”

唐梦赉：字济武，号岗亭，别名豹岩，淄川人，顺治六年进士，官至翰林院检讨，不久因触连权要罢归。他不

以地位之悬殊而与蒲松龄为文字交，经常诗词唱和。他对《聊斋志异》的创作十分支持，曾于康熙二十一年为《志异》作序，并称《志异》中的故事“凡为余所习知者，十之三四。”他还为《志异》的创作提供素材，《志异》中之《泥鬼》篇，乃唐所述。

毕际有：字载绩，淄川人，顺治三年拔贡入监，后考任知县、知州、康熙二年罢官乡居，聘蒲松龄为家庭教师，交往十四年。他与蒲氏为文字交，《聊斋文集》中，有不少蒲松龄为毕氏代写的文章、书信。毕际有对蒲氏创作《聊斋志异》持支持态度，还亲自为《志异》写文章，《志异》中《鸬鹚》、《五羖大夫》篇末俱载明为毕际有所作。

袁宣四：名藩，号松篁，字宣四，淄川人，康熙二年举人。康熙十二年，他与蒲松龄共同参与纂修县志之事，得以相识，遂为挚友。袁喜诗词，蒲氏经常与他唱和。二人均为高才名士，同样科举蹉跌，故而情感相通，颇多共同语言，《聊斋词集》仅收蒲氏词一百零二首，竟有十四首为与袁宣四唱和之作。袁氏对《聊斋志异》的态度如何，未见明文记载，但《志异》中《龙》篇末载“袁宣四言”的一个故事，可见宣四亦应为《志异》的支持者。

蒲松龄生活在明末清初的七、八十年间，经历了王朝的更替。这个时期，社会由动荡而趋于平稳，但动荡始终不断；经济由凋弊而转向繁荣，但百姓仍然饱受天灾人祸和掠夺之苦；思想由活跃而日渐统一，但新的思想观点仍

不可遏制。这种社会、经济、思想的背景，给蒲松龄的思想和《聊斋志异》的创作打下了深刻烙印。

明朝末年，社会黑暗腐朽，各种社会矛盾尖锐复杂。统治集团内部，有东林党与魏忠贤阉党之间的斗争；最高统治者相互勾心斗角，明末挺击案、红丸案、移宫案是其明证。统治阶级对人民的掠夺和压迫更加残酷，他们兼并土地，加派辽饷、杂项，掠取矿税、盐税，使农民、市民更加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因此，明末农民、市民的起义此起彼伏，苏州纺织工人、市民的抗税斗争，江西景德镇瓷工的暴动，山东徐鸿儒白莲教农民起义的揭竿而起，都极大地动摇了明王朝的统治。而声势壮阔的李自成农民起义，历时十多年，终于推翻了明王朝。接着，满清入关，建立了清王朝。明朝残余势力先后建立福王、鲁王、唐王、桂王政府，企图与清政府抗衡。李自成残部郝摇旗、李过、李来亨，张献忠残部李定国、刘文秀等坚持抗清。郑成功则在东南沿海抗击清军。其间，原来降清的吴三桂和耿精忠、尚之信亦起兵反清。这些军事行动直到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才被逐个平息。可见，在清王朝建立四十年后全国才真正得到统一。那时候，蒲松龄已经四十四岁了。这种由动荡到平稳，既有民族矛盾又有阶级矛盾的社会现实，蒲氏必然有所知晓，而蒲氏家乡的谢迁起义、于七起义为蒲松龄耳闻目睹。这对蒲松龄民族意识的形成，同情抗暴起义思想的发展，无疑都产生过重要的作用，并且在《聊斋志异》得到不同程度的反映。比如《采薇翁》反映“明鼎革，干戈蜂起”的情况；《王司马》、《辽